

“相信法律,但不相信某些执法人”

“开胸验肺第一人”张海超代理的尘肺病人维权怪圈

本报深度记者
朱洪蕾 张洪波

“我把工友开胸验肺的路堵死了”

齐鲁晚报:8月1日出院后,感觉自己身体怎么样?

张海超:呼吸比以前好太多了,现在回家爬4楼也没问题。

齐鲁晚报:还住在无锡?

张海超:对,术后每周都要复查,来回跑不方便,在这边租房住。

齐鲁晚报:感觉你还是不时咳嗽。

张海超:手术后每个人都有不同反应吧,有些干咳,没痰。

齐鲁晚报:等身体好转了,能恢复劳动能力吗?

张海超:基本上得4至6个月,或者8个月,不可能恢复到常人水平,但有工作能力,以后还是不能再从事重体力劳动。

齐鲁晚报:那是不是也要重新考虑一下未来了?

张海超:肺移植以后很难预料。现在我不愿意想那些事,想太多了对自己有很大压力。包括以后的医药费,我剩下那些钱,也就够维持两三年的了。先活下来再说。

齐鲁晚报:女儿也应该上小学了吧?

张海超:是啊,我现在还没有见到她。我常常想起她在我查出尘肺病时的样子,她问我:“爸爸,你要是不到40岁就走了,那时候我多大?”

齐鲁晚报:手术后还要花很多钱买药?

张海超:手术花了37.5万,肺移植后前3个月,每月医药费就得25000元左右。有病友调侃说吃两粒药得五百多,像在大饭店吃了一桌菜似的。我觉得跟吃了两个小金豆一样,都不敢多吃饭,生怕吃多了把小金豆吐出来。

齐鲁晚报:不久前,公众才知道2009年你其实获得了120万元赔偿,而不是之前说的61.5万。

张海超:那120万其实是封口费。当时诊断出尘肺病的有几十个人,企业说不可能每人都给120万,他们让我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对外我只能说赔偿了61.5万,这样可以降低企业以后对其他工友的赔偿额度,当时我迫不得已答应了。现在顶着压力公布真实赔偿,就是想借此为更多尘肺病患者争取这一线活下去的希望。

齐鲁晚报:当时别人也这样?

张海超:据我了解,当时其他工友对外说的赔偿款也少,这都是为了配合单位对后来者减低赔偿标准而不得已撒的谎。

齐鲁晚报:这120万在4年后救了你的命。

张海超:当年我闹得最凶,所以我得到的赔偿最高,有的工友才拿到十多万元。

齐鲁晚报:在尘肺病人维权中,是不是谁闹得越凶,就能拿到越多赔偿?

张海超:因为我是“开胸验肺第一人”,不幸中的万幸,但是我把工友开胸验肺的路给堵死了。

鉴定难度不是降低
了,是更难了

齐鲁晚报:所以有人想效仿你,用极端的方式引起社会注意?

张海超:是,经常有患者在联系我时,提到自己也想开胸验肺,因为依靠鉴定来维权的



张海超以开胸验肺这种极端方式为自己维权。(资料片)

从4年前在绝望中
开胸验肺,到今年6月底
在无锡移植双肺。“开胸
验肺第一人”张海超终
于在8月1日出院,重新
开始一段依旧前途未卜
的新生活。

这4年,张海超一直
在维权——帮助与他一
样患上尘肺病的农民工
兄弟维权。

但重获人生的张海
超依旧迷茫。8月9日,在
与齐鲁晚报记者的对话
中,张海超说,他相信法
律,但不相信执法;他不
赞成尘肺病患者用极端
手段维权,但又找不到
更有效的路子救他们、
救自己。

路太难走了。如果在维权的道
路上屡屡受挫,就会有人走向
极端。

齐鲁晚报:不是有人说,张
海超开胸验肺之后,尘肺病鉴
定的难度降低了吗?

张海超:很多人都这么说过,是张海超让难度降低了,其实不然,是鉴定更难了。比如说我原来去综合性医院鉴定,除了职业病防治所说不是,其他医院都说是尘肺病。现在呢,综合性医院为了给自己减少麻烦,他们也不说你是尘肺病,只告诉你不是肺结核、不是肺癌,你还得去职业病鉴定是不是尘肺病。

齐鲁晚报:也就是说医院
再多,但“说了管用”的还是只
有职业所。

张海超:对,有的工人去医
院时会录音,证明我是尘肺病,
但现在综合医院的医生都很精
明,他们不想给自己带来麻烦,
干脆什么都不提。所以尘肺病
人的鉴定门槛实际上是提高
了,职业所说你是,你就是;职
业所说你不是,你就不是,没法
说理去。而且鉴定都被当地垄
断了,一个大企业,很容易跟当
地鉴定部门打交道,很容易产
生问题。但跑到外地鉴定,法律

但他们弄丢了,没法执行,因此
法院只能驳回诉求。

齐鲁晚报:后来呢?

张海超:后来他遇到的问
题就是绝大部分尘肺病患者都
会遇到的了。诊断结果是二期
尘肺特征,但无可靠性粉尘接
触史,因为企业拒不提供材料,
我就带他去相关部门讲道理,
最后卫生监督所的人答应去他
原单位检查,结果他们早就打
扫好了,去就合格了。我说黄福
华在这儿工作了好几年,都合
格的话,他怎么会得这个病?后
来黄被鉴定为二级尘肺病,鉴
定之后,企业不服,又去申请鉴
定,去省里面鉴定,我就去跟省
里说,你们要是把结论推翻,我
同样可以告你们。

从2011年12月一直打到2012
年5月份,最终鉴定结果是二期
尘肺病,但后来工伤认定企业在
程序上能拖就拖,又开始行政复
议,后来法院判了,可在赔偿时,
又发现企业虽然买了工伤保险,
但是没有足额买,给黄福华是按
最低工资买的。当地社保局的说
法是,只要企业给买了,是否买
够了,我就不再监管了……

齐鲁晚报:真是每一步都
一波三折。

张海超:我2011年年底去
过1次,2012年去了6次,一共去
了7次,律师又去了两次,这个事
还没结束,估计还要再去。刚
认识黄福华时,他住在5楼,噌
噌噌就上去了,现在走路都费
劲了,再拖人都拖不到了。

齐鲁晚报:每个怀疑自己
患上尘肺病的农民工想诊断和
维权都这么难吗?

张海超:维权普遍是这种情
况,官司没有终结以前,拿不到
任何赔偿,一拖几年,有好多应
该拿到钱的人也已经病危了。拿
到赔偿的人也不好活,拿到几十
万,医药费、生活费,到最后钱花
完了,人也死了,人财两空、家破
人亡。你说我算高额赔偿吧,但
现在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再过几
年,同样也是钱没了,人也没了。
不管钱多钱少,最后都难逃人财
两空的局面。

齐鲁晚报:那你为什么还
要坚持帮人维权?

张海超:我深知维权艰难,
后来因为身体原因,我丧失了
劳动能力,别的也做不了,自己
知道维权的艰辛和疾病折磨的
痛苦,还有带给家庭的压力,特
别同情这个群体。再加上自己
在尘肺病群体中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就想选择一些具有代表
意义的案子,一方面能帮助他
们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群体,另
一方面,也通过媒体的呼吁报
道,推动中国的法制进程。

齐鲁晚报:感觉这4年来尘
肺病人维权方面有进步吗?

张海超:工人尚未觉醒,公
众却已麻木。

齐鲁晚报:怎么说?

张海超:因为这样的事情
太多了,大家已经麻木了。开始
觉得这些人真可怜,后来一看
全国这么多呢,帮不过来了。我
现在帮着患者维权,哪怕这个
案子再有影响力、有代表性,如
果这种事情特别多的话,媒体
的作用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所
以,现在靠媒体的关注解决这
件事情不是根本、长久之计,还
得通过政府和各方的努力。不
要让尘肺病患者非要走上极端
才能引起公众关注,我还是想
让所有的尘肺病患者都有一个
正常的、快捷的法律解决途径。

齐鲁晚报:也就是说,你还
相信法律?

张海超:我对有关部门充满
了不信任,但是现在我还是鼓
励这些人走正常的法律途径,法
律是值得信任的,但对某些执法人
我是不信任的。

王克勤:

国家需立法,接盘 600万尘肺病患者

本报深度记者 肖龙凤

“开胸验肺、劫持人质这样的
事情,只是一个开始。我最担心的
是,在中国未来5到10年,尘肺病
患者的维权事件会以更加离奇、
极端的方式‘井喷式’地出现。”中
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
(以下简称“大爱清尘”)发起人王
克勤向齐鲁晚报记者连举5个数
据:当下中国患尘肺病的农
民工人数保守数字是600万;这些
人面临被活活憋死的命运,死亡率
是22.04%;他们均是30到40岁的中
青年人;每一个小时,就会有一个青
壮年农民工被活活憋死;每年新增
两万尘肺病农民工患者。

王克勤说:“现在的情况是,
维权基本靠个人,而且困难重重。
面对随时会死亡的命运,他们做
出什么事情来都是有可能的……”

2011年6月15日,大爱清尘公
益项目启动,到2013年7月31日,
大爱清尘累计筹款9354482.41元;
累计救治患者759人;累计助学263
人;累计发放制氧机236台。

大爱清尘志愿者陈华洋介
绍,尘肺病有开放式疗法和保守
疗法两种治疗方式,保守疗法时
间长,且花费几十万未必能治得好;
开放式疗法即洗肺,对尘肺一期、
二期患者效果较明显,可减轻
病痛,延长寿命。大爱清尘为每位
患者提供一万元的专业医疗救
治,可以洗一次肺。

王克勤说,将救治额度定在
不超过一万元,是一个非常无奈、
非常纠结的决定,因为民间救助
最缺的就是“钱”。“为600万尘肺
病农民工提供最低的一万元洗肺
手术费,就是600亿,每人10万则
是6000亿!任何一个民间公益组织
都扛不起这个担子。”

“尘肺病是工业化过程中不
可避免的问题,美国在上世纪30
年代、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就消
灭了尘肺病。我们这么庞大的一
个经济体,也一定能解决这个问
题。”在具体时间表上,王克勤谨
慎表示,“我相信再过20年,总
会有个好结果。”

王克勤所说的好结果,就是
由国家通过立法和制定公共政
策,来接盘600万尘肺病患者
的治疗和生活保障问题。

为什么要由国家接管尘肺病
患者?王克勤讲述了欧洲的经
验,“尘肺病是人类工业史上的老
话题。19世纪中叶,欧洲大面积出
现尘肺病劳工,成为很严重的社
会问题。他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时,
难题出现了,责任主体即伤害主体
难以确认,因为大部分劳工是‘流
动作业’,到底是哪座矿山、哪个
老板的粉尘把你的肺搞坏的?欧
洲社会有了一个共识,尘肺病是
在为国家和社会创造财富的时
候得的,甚至由此被剥夺了健康
和生命。尘肺病是一个职业病,
国家理当偿还。于是欧洲在19世纪末
推出一系列公共政策,由国家通
盘接管所有尘肺病救治。”

王克勤说,参照欧美的经验,
大爱清尘旨在通过公益救助、宣
传、调研等,引起社会各界对尘
肺病患者的关注和救助,让“尘
肺病”这三个字成为中国的公共
话题,最终推动国家立法和公共政
策的出台,既解决尘肺病患者的
救治问题,也通过立法和监管,督
促企业改善工作环境,从根本上
消除尘肺病。